



棚生簋中的「取」字及其器主問題補說

陳英傑

(福州) 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

摘 要

棚生簋或稱格伯簋，其器主問題至今尚存爭議；銘文第二句「格伯○良馬乘于棚生」之○作或等，該字對確定銘文中的人物關係具有關鍵作用，但由於種種原因，其釋讀仍存在較大分歧。本文內容主要有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考證棚生簋中的○字，對相關考釋意見進行了辨析，並從○字的書寫筆勢、「爪」字偏旁的一般寫法以及偏旁表意的位置關係等三個角度，論證其為「取」字，釋「受、爰、𠂔」等說均不可取。第二部分基於「取」字的釋讀，進一步從相關銘文文例、銘文文體性質以及族姓角度論證器主為棚生，該器應稱為棚生簋。族姓是一個較新的解決問題的線索，本文雖認同棚生簋中的格伯就是霸伯的說法，但也指出其相關證據尚不足的現實困境。



關鍵詞：棚生簋、取、器主、族姓、格伯、霸伯

Supplement of the problems about “取” in *Pengsheng* Gui and the owner of this bronze ware

Chen Ying-jie

(Fuzho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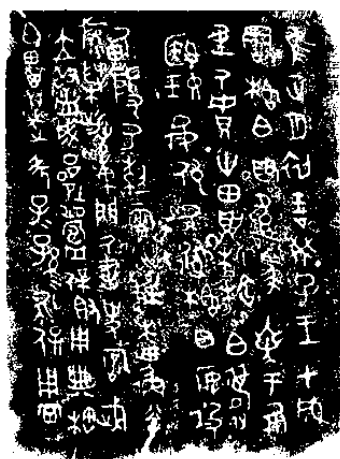
Pengsheng Gui is also called *Gebo* Gui,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owner of this bronze ware so far. In the second sentence of the inscription “格伯○良馬乘於棚生”, the “○” was writed as  or  etc. This character plays a key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in the inscription, but for various reason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character is still quite different.

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 in *Pengsheng* Gui, analyzing some relevant opinion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writing-style, the general writing methods of “爪” in inscriptions and the positional relationship of ideograms, we can prove that this character is “取”, other statements like “受、爰、受” etc. are not desirable. In the second part, basing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aracter “取”, according to examples of the relevant inscriptions, stylistic nature of this inscription and family name, we make further proves that the owner of this bronze ware is *Pengsheng*, so this bronze ware should be named *Pengsheng* Gui.

Family name is a relatively new clue to solve the problem. Although in this paper we agree the statement which considered that *Gebo* in *Pengsheng* Gui is *Babo*, we also point out the relevant evidence is not enough.

Key words: *Pengsheng* Gui, 取, the owner of this bronze ware, family name, *Gebo*, *Babo*

棚生簋，舊稱格伯簋，《殷周金文集成》（下簡稱《集成》）著錄有四件，見下圖：



4262 蓋、器銘拓



4263 銘拓



4264 蓋、器銘拓









4265 銘拓



因為簋銘記錄了一次西周中期的土地交易活動，並記錄了定立約劑的過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四件棚生簋銘文文字個體大多都比較粗率，其中4263銘奪文竟達十七字之多（4264器銘奪三字）。銘文仍有一些詞句還沒有完全釋讀，但整篇銘文大致的意思還是比較清楚的。對於該器的器主（作器者）是誰，有兩種看法，或認為是格伯，或認為是棚生。相應地，器物定名也就有格伯簋和棚生簋兩種稱謂。現在似乎較多的學者傾向於器主是棚生，但仍有持格伯說者。銘文第二句「格伯○良馬乘于棚生」，是理清銘中兩個主要人物——格伯和棚生交易關係的關鍵句，但其中○字釋讀尚未定論。由於器主問題關涉到

相類銘文敘述模式以及相關銘文性質的判定等重要問題，因此，該銘仍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一

○字共出現六次：  (4262)、 (4263)、  (4264)、 (4265)，各字形之間我們可以設想如下的書寫變異關係：



其字主要有「受¹、取²、受³、爰⁴」等釋法。最後一形發生了構件層面的變異，如果以此形為規範字形而作為考釋依據，肯定跟以第一形作根據得出完全不同的考釋結果。但一般情況下，不能把低頻寫法作為依據。對於文字的演變，同一個字共時的和歷時的異體越多，我們就愈能恢復出書寫變異的細節。







¹ 吳式芬《攷古錄》卷三頁十三「格伯敦」釋「受」，光緒廿一年刻本。孫詒讓亦釋「受」，參《古籀餘論》卷三頁十六。連劭名釋「受」，解為接受義，認為是格伯接受了棚生的四匹好馬，卅田是格伯付給棚生的馬價，稱之為棚生簋，參《棚生簋銘文新釋》，《人文雜誌》1986年第3期。彭裕商釋「受」讀為「授」，稱之為格伯簋，參《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359。












² 容庚：《金文編》（頁191，格伯簋）和董蓮池：《新金文編》（頁342，棚生簋）都從「取」之釋。其他釋「取」者，如于省吾：《雙劍謠吉金文選》（北平：大業印刷局，1932年）上三，頁13；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頁348，127號格伯簋（云同銘者五器）；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143棚生簋（云傳世共三器）。劉釗云：「棚生簋銘文記載的是格伯用卅田換取棚生良馬的一場交易。」參《利用郭店楚簡字形考釋金文一例》，《古文字研究》第2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80。裘錫圭最初認為釋「受」不可信，而從「取」釋，稱之為棚生簋（1991年）；但後來又認為釋「受」是對的，器應稱為格伯簋（1994年），參《西周銅器銘文中的「履」》，《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三卷，頁31-32文及其按語；及《釋「受」》（頁80-81）。從《裘錫圭學術文集》對二文所加按語看，裘先生還是堅持《釋「受」》文的意見。裘先生釋「受」說影響比較大，白於藍從其說，亦認為格伯是受田方，器稱為格伯簋，參《師永孟新釋》，《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5期。黃天樹師亦從裘說，並重新疏釋了融比盨銘文，參《融比盨銘文補釋》，《黃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深圳：中國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


³ 郭沫若釋「受」，付義，格伯付良馬四匹于棚生，參《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頁81-82格伯簋。楊樹達則認為釋「受」、「受（授）」均通，參《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0「格伯毀跋」。《漢語大字典》「受」第一個義項「給予，付給」下就據郭說引用了格伯簋銘作為書證。李學勤先生在討論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問題時利用了棚生簋的材料（但沒有涉及○字的討論），云：「格伯簋記格伯給棚生良馬四匹，『厥價卅田』，「格伯以良馬交換了棚生的三十田」。參《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光明日報》1983年11月30日。

⁴ 唐蘭名為棚生簋，字釋「爰」（參《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42，但只有銘文釋文，沒有注譯，據其對趯鼎「取微五爰（鏹）」的注釋，他認為「爰」有交付、交換義（頁309）。朱其智：《格伯簋還是棚生簋》（未刊稿）從釋「爰」說，器稱格伯簋。








一個字的不同異體構成文字考釋的硬核證據鏈。這也是我們提出「異體字是研究文字形義系統的核心問題」這個命題的理據所在。⁵其實，對於○字的考釋，各家的思路相當程度上受制於各自對格伯和棚生交易關係的判斷：用來交換的卅田到底是哪一方的，屬於格伯，還是棚生？或表述為：良馬乘是誰的，是棚生的，還是格伯的？大家在各種可能的考釋結果選擇中，有讓字形屈就文義的傾向。諸家都沒有考慮「孚」的釋法，應該跟其無法疏通文義有關。⁶

○字釋為「取」，無論是從文義還是字形上（詳下文），都很允洽。○字左半構件規範寫法是四橫畫，第一形「耳」旁尚保留著原始構形。九年衛鼎（《集成》2831西周中期）之、親簋（《銘圖》⁷5362西周中期）之、猗簋（《銘圖》5258西周中期）之、柞伯簋（《銘圖》5301西周中期）之、峻簋（《銘圖》5386西周中期）之、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之等確定的「取」字可資參照。









商周金文「受」字典型構形有（《金文編》274-275頁）：、、（商），、（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明顯與簋銘字不合，釋「受」者乃較多屈就於對銘中所記交易關係的前定理解。







「爰」字金文罕用，族氏文字之（爰鼎，《銘圖》74，商代晚期）多釋為



⁵ 陳英傑：〈商周金文異體字研究：以「旅」字為例〉，《中國文字》新45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9年）。

⁶ 《說文》：「孚，五指持也。」「持」他書引《說文》或作「捋」。段玉裁改為「五指孚也」，並認為他本作「持」者乃「孚」之誤，云：「凡今俗用五指持物引取之曰孚，《廣韻》曰『今孚禾是』是也。」「捋」字下曰：「五指孚者，如用指取禾采之穀是也。」从「受」，段注解釋為：「五指孚而落之，故从受。」又「捋」字段注：「孚下云：『五指持也』，宋本云『五指持也』，皆未是。《廣韻·六術》云：『孚，持取，今孚禾是。』是則許當本作『五指持取也』，五指持而取之，於義乃合」。段玉裁「孚」、「捋」注語相矛盾，雖指出「孚」、「捋」各字而義不同，但對「捋」之「取易」義沒有解釋，據毛傳而認為「取」為其本義。大概只有王筠《說文句讀》解釋了「取易」之「易」，云：「容易之義。亦有輕易之義。」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卷二十三：「言其輕而易舉耳。」王筠認為「捋」是「孚」的繁增字。張舜徽亦云：「捋即孚之後起增偏旁體，非二字二義也。許君以捋訓孚，明二字本同矣。」（《張舜徽集》本〔上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四冊，頁2953）綜合來看，《說文》當本作「孚，五指捋也」。孚後作「捋」，其雖也有「取」之古訓，但其具體意義是「五指捋」，使用範圍比較狹窄，如《詩·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捋之。」《王力古漢語字典》解釋為「以手握物，順移脫取」比較準確（引申為順手撫摩，如「捋髭鬚」。（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68），鮑照：〈紹古辭〉之七「軟蘭葉可采，柔桑條易捋」，用義同。金文戰爭銘辭中，「孚」表掠取、奪取，或讀為「捋」，但文獻中「捋」似無掠取義；或認為是「孚」之訛；或讀為「掠」。戮簋（《集成》4322西周中期）「孚、孚」同時出現：「孚（）戎孚（）人百又十又四人」（蓋銘。器銘作），侯鼎（《集成》2457西周早期）云「卑金甗」，師同鼎（《集成》2779西周中期）云「車馬」、「戎金甗」。

⁷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其《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文中簡稱《銘續》。

「爰」。新著錄的春秋時期復丰壺銘（《銘圖》12447、12448）「△得吉金」之「△」，甲壺作、乙壺作，多釋「爰」，但與虢季子白盤（，《集成》10173西周晚期）、鄂君啟節（，《集成》12113戰國中期）、商鞅方升（，《集成》10372戰國中期。睡虎地秦簡作，可參）中的「爰」字寫法不屬同一演變序列。葛亮先生云：「『爰』字，甲壺字形从『爪』从『又』，中部又有一筆與『又』相疊，僅看字形，此字釋『爰』或『孚』均有可能；從文義看，復丰聘於魯，是因為不廢公命而得到吉金（出自魯侯或齊侯賞賜），而不是從魯國奪取、掠奪（孚）吉金，因此壺銘之字只能釋作『爰』，表示承接關係，如同『於焉』。」⁸據復丰壺，融比簋蓋之（《集成》4278）、鼎（《集成》2818）之釋為「爰」也未嘗不可。

釋「爰」一說，大概只有裘錫圭先生作了字形考證。裘先生認為「孚」和「爰」混用過相同的字形，「孚」由（趯簋，《集成》4266西周中期）演變為（毛公鼎）形，就與「爰」混同了，並把棚生簋字看做二者混同的例證（字形是「孚」，音義是「爰」）。他把棚生簋字形左旁看作「爪」之變體，並說，如把形改為豎寫，就與金文中作的「孚」字無別了（《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三卷第81頁）。也就是說，裘先生先把棚生簋字豎過來，然後從字形上認同為「孚」，再基於「孚」、「爰」字形混同的假設，根據簋銘文義，把其再釋為「爰」。中間經過兩次假設。但在西周時期，「孚」兩手之間以寫作粗實的圓點為常見，如（鬲簋，《集成》4215西周晚期）；少數寫作一小短橫，如（楚簋，《集成》4246西周中期）。而且，字形平面結構布局是有規範的，不能隨便正側、橫豎變換。所以，釋「爰」理據也不充分。⁹

但無論釋「爰」還是「受」、「爰」等，這些字上面均从「爪」，一般只寫三根手指，包括「孚」字也是如此。而棚生簋此字有三個字形是明確寫作四橫畫（包括底部的豎彎橫畫），有兩個字形雖有訛變，但其筆勢所呈現的四橫畫趨勢還是可以看出來的（字形變異鏈條中的第4、5二形），只是末彎橫筆稍微出了一點頭兒而沒有完整鑄出來。金文中从臼（雙手形）的字，如與、興、農、盥、鬻等字的「爪」形沒有一例這樣寫的，這應該不是偶然的。最後一個字形，見於4264器銘，蓋銘作，而且同套器物的其他寫法也可以構成異文互證的關

⁸ 葛亮：〈復丰壺探研〉，《傳承與創新：考古學視野下的齊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另參魏宜輝：〈復封壺銘文補釋〉，《漢語史與漢藏語研究》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⁹ 「爰」缺乏先秦文獻使用證據，古書中與「苒」、「殍」、「藁」、「標」等牽扯，多與「落」義（擊落、零落）有關。一般認為「苒」、「殍」所从之「孚」當是「爰」之訛，正字作苒、殍。














係。「受、孚、孚」所从之「爪」有極個別寫作四指的，¹⁰但偏旁間的位置關係跟「取」不一樣。這是字形上的一個重要差別。而且前文說過，棚生簋銘書寫比較草率，其「取」字的變異形體呈現出濃厚的個體特徵，考釋該銘時，對其文字草率的特點應該予以考慮。

綜上，「格伯○良馬乘于棚生」中的○字應該釋為「取」，該句意思是說，格伯從棚生那裏換取了良馬乘。銘文記載，這些良馬乘是格伯用卅田交換的。

二

在解讀棚生簋銘文及確定其器主時，研究者已經注意到裘衛盃（《集成》9456西周中期）敘事模式跟棚生簋的相似性，今列表比較其銘文結構、辭例，大概可以幫助我們廓清一些爭議。

器名 文例	裘衛盃	棚生簋
時地	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禹旗于豐	唯正月初吉癸巳，王在成周
事件： 以田換物	矩伯庶人取董章于裘衛，才八十朋， <u>𠂔賈</u> 其舍田十田；矩或 <u>取</u> 赤虎兩、甗奉兩、奉𠂔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	<u>格伯取良馬乘于棚生</u> ， <u>𠂔賈</u> 卅田
析券		則析
受田、履田	裘衛乃𣦵告于伯邑父、榮伯、定伯、隰伯、單伯，伯邑父、榮伯、定伯、隰伯、單伯廼令參有嗣：嗣土散邑、嗣馬單旗、嗣工	格伯履，毆妊玆（及）𠂔𠂔從格伯安（按），玆甸殷，𠂔剝霄谷杜木、邊谷旆桑，涉東門

¹⁰ 癸鐘（《集成》254西周中期）作（或摹作），但同人作銘之「受」都不這樣寫。揚簋（《集成》4295西周中期）「取、孚」作：、，4294同銘，但拓本不好，「取、孚」作、，「孚」寫法比4295規範。卯簋蓋（《集成》4327西周中期）有字作（或摹作），有取、孚、孚等多種釋讀，對其形與義的解釋尚有分歧。西周金文「取」字一般作左右結構，也有上下結構者（「又」旁或偏居右下或左下），如楚簋（《集成》4246-4249西周中期），但「耳」旁不橫寫或斜置。牧簋（《集成》4343西周中期，宋人摹本）「孚」摹作。多友鼎（《集成》2835西周晚期）「孚」字七見，其清晰者如：、、、。

器名 文例	裘衛盃	匍生簋
	邑人服，眾受田。 燹趙、衛小子鞫、逆者（圖）其卿（向） ¹¹	
立誓		畢書史戡武，立盥成壘 ¹²
作器	衛用作朕文考惠孟寶盤	鑄保（寶）簋
用途銘辭		用典格伯田
祈福之辭	衛其萬年永寶用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族名		

裘衛盃（《集成》9456西周中期）中，矩伯取物，矩伯舍田，裘衛受田。以此例之，匍生簋中亦是格伯取物，格伯舍田，匍生受田。勘履田地時，舍田和受田雙方都有人參加。裘衛盃中，器主裘衛是作器句及其後面祈福之辭的主語，反復出現。而匍生簋中的器主匍生全銘只出現一次，作器句及其後的用途銘辭和祈福之辭的主語均省略，這就導致器主判斷的客觀困難，匍生簋銘本身提供的信息難以充分解決大家對其器主問題的爭議。作器句及其後用途銘辭或祈福之辭的主語不是必須出現的，省略的情形也有，但前後文一般會有明確的主語提示，若有承前或蒙後省略的情況，都能通過單篇銘文本身看出來。¹³另外，由於器物空間的限制，銘文記事內容的省略是經常的，賞賜物、典禮儀式等都會省略，而且隨意性也比較強，有的省略對銘辭的理解會造成障礙。¹⁴比如對於西周冊命程序、土地轉讓程序等的認識，就要放到一定歷史時期，結合所有相關的冊命、土地轉讓銘文來考察。匍生簋器主問題的解決，也得採用這種方法，即：基於一般銘文的行文、謀篇規律，比勘格式相類、內容相關之其他銘文，尋找銘文通例上的釋讀線索。另外還得結合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如

¹¹ 參白於藍：〈師永孟新釋〉，《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5期。











¹² 此句釋讀，參張振林師：〈釋「立盥成壘」與「鑄保簋用典格伯田」解〉，《文字學論叢》第五輯（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

¹³ 可參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文例類纂〉，《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下冊。

¹⁴ 金文中有一些銘文，如《集成》9454土上盃，作器句無主語，作器原因部分王所命令的是土上和史寅二人，其器主暫時還無法確定。

張振林師所指出的，當時社會「農重於工商，擁有田土貴於持有貨財」。¹⁵ 歷史背景性質的內容，一般不會直接呈現於銘文中，需要綜合各種文獻資料進行分析判斷。再者，「銘」這類文體，記錄的都是光宗耀祖的事，對個人對宗族都光彩有利的事。因此，受田方作器與當時的歷史場景以及「銘」這類文體的性質相合。而通過「格伯取良馬乘于棚生」的確釋，可以知道棚生簋銘中棚生是受田方，就應該是器主。



另外判斷棚生簋器主還有一個線索，以往由於材料所限，大家很少往這個方向考慮，那就是從族姓的角度來判斷。山西省大河口霸國墓地所出青銅器銘文材料，把這個問題給提出來了。

棚生簋有族氏文字，金文中有一支周氏使用這個族徽，如周彝生簋（《集成》3915西周中期）作，¹⁶ 周夢壺（《集成》9691西周中期）作、，¹⁷ 周乎卣（《集成》5406西周中期）作、；¹⁸ 周晉盃（《銘圖》14793西周中期）作，還有一同銘文的盤（《銘續》950）；¹⁹ 周宅匜（《集成》10218西周晚期，為救姜作器）作，這個家族屬妘姓。²⁰ 為區別，「周」又寫作「琚」，如函皇父鼎（《集成》2548、2745西周晚期）為其妻「琚妘」作器，琚作，字亦可省為（見琚我父簋蓋銘，《集成》4050西周晚期，器銘則作）。棚生為棚氏之甥，²¹ 西周時期之棚國為媿姓，而棚生是妘姓周（琚）氏族人。

山西絳縣橫水鎮發現了棚國墓地，橫水墓地和山西翼城縣大河口墓地間的直線距離約四十二公里，發掘者認為這兩個墓地應屬於同一人群的不同分支，同屬於媿姓狄人。²² 我們傾向採信這個說法。大河口霸國墓地發現後，有不少

¹⁵ 張振林師曾根據裘衛盃和棚生簋的敘事格式以及金文文體（「銘」）謀篇構意的規律和當時的禮制，而論證簋為棚生所鑄，參《釋「立錫成壘」與「鑄保簋用典格伯田」解》。

¹⁶ 為楷妘媿所作媿器。

¹⁷ 為公日己所作祭器。9690壺作、。

¹⁸ 為文考庚仲所作祭器。

¹⁹ 銘云周晉早喪馱考辛仲。

²⁰ 董珊：〈試論殷墟卜辭之「周」為金文中的妘姓之琚〉，《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7期。

²¹ 關於兩周金文中「某生」的解釋，參張亞初：〈西周銘文所見某生考〉，《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5期。

²² 參謝堯亭：〈棚國和霸國——晉南發現的兩個西周新封國〉，《故宮文物月刊》2012年第354期；謝堯亭：〈解讀霸國〉，《呦呦鹿鳴——燕國公主眼裏的霸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另參李建生《輝縣琉璃閣與太原趙卿墓相關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2期；張天恩：〈晉南已發現的西周國族初析〉，《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1期，等。由於缺乏直接的銘文內證，關於霸國族姓還有爭議，如：或認為是文獻所載春秋時期潞國之前身（黃錦前、張新俊：〈說西周金文中的「霸」與「格」——兼論兩周時期霸國的地望〉，《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5期）；或認為是文獻所記之柏國，姁姓（馮時：〈霸國考〉，載《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等。霸國非姬姓國，大家則認識比較一致。

學者根據「霸」字多種異體寫法認為，金文中的「格伯」（至少有一部分）就是「霸伯」。關於棚生簋的格伯是否就是霸伯，學術界意見還不一致，²³但肯定的一方和否定的一方，證據都嫌不足。或試圖從族氏分佈地域的角度證明棚生簋中的格伯跟霸伯無關，但這種說法暫時也難以說服人，畢竟我們對於當時族群的地理分佈還不能完全掌握，當然也就不能從「可能」或「極可能」的推論推導出「必然」的結論。

我們之所以傾向於認為棚生簋的格伯是霸伯，有兩點考慮：一、棚生簋銘和霸國青銅器銘文，都呈現出草率的特點，書寫變異嚴重，且有相類的變異特點，如果缺乏相關異體證據，有些「格」、「霸」構形就無法得到正確分析和釋認。這很可能說明棚生這個族群和霸國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影響。二、霸國青銅器銘文中的國族名「霸」有多種變異寫法，主要集中於「雨」下的構件「朝」，「革」旁或寫成「事」、「史」，或寫成「東」、「束」、「𠂔」（象彙形）等形；右下从「月」，或寫成从「各」（有的訛得不成字），或寫作从「攴」（倒止形。金文中「各」字有省「口」寫成「攴」的）。有的乾脆省略「雨」字頭，直接寫成「𠂔」（參附錄「格、霸相關字形對照表」）。²⁴曾仲大父蠡簋「既生霸」的「霸」也很特殊，《銘圖》隸定為「𠂔」，其實該字右下部件上部是「月」下部是「攴」，是「朝」、「格」兩字的雜糅體，大河口墓地M2：37格伯甗之「格」也當是雜糅體，右邊上部是「月」（寫訛）下部是「口」。但大河口所出也有確定的、規範的「格」字。霸國墓地M2002霸仲、格仲同出，寫作「霸」佔多數，據之推認格、霸同字應該是可以的。「霸」字各種異體之間同字關係的確定，並不需要一定要在同一篇銘文中出現異文方可確認，異器同銘、不同銘文的相同辭例以及同墓葬所出的器物組合等都可以幫助確認其間的異體關係。

「霸」字左下之「革」的各種異寫可以用寫訛進行解釋，據已有文字材料也能恢復其變異的脈絡，但右下从「各」的寫法，解釋為訛寫就缺乏說服力，最直接的一個考慮就是表音。²⁵霸上古音屬幫母鐸部，霸以羣為聲符，羣，《說文》云「讀為膊」（滂母鐸部），徐鉉據孫愐《唐韻》注音為「匹各切」。各、格屬見母鐸部。金文月相的「既生霸」、「既死霸」之「霸」文獻中寫作「魄」（滂母鐸部），霸主的霸或寫作「伯」（幫母鐸部），魄、伯之聲符「白」屬並母鐸部。貉（匣母鐸部）與貊（明母鐸部）通。狐貉字，一般認為「貉」是正字，

²³ 如鄒英都、馬超：〈西周金文所見佚記古國及相關問題討論〉，《歷史研究》2019年第5期，頁134。

²⁴ 金文月相中的「霸」有個別寫成「羣」的。

²⁵ 學者們已經試圖從聲符角度對各、百（白）進行溝通，參上引黃錦前、張新俊文。

貉是假借字，如《說文解字》「貉」段玉裁注云：「凡狐貉連文者，皆當作此貉字。今字乃皆假貉為貉，造貉為貉矣。」貉或作「貉」（虞屬見母魚部）；或作「貉」，右旁蓋是「罷」之訛，「罷」可假為「百」。²⁶由从「各」聲之字與相關字的通假、通用關係看，見組聲母與幫組聲母存在較密切的關係，但各聲與百（白）聲溝通，所可依據的材料基本就是貉、貉相通以及貉讀為「百」的漢人注釋材料。²⁷《說文》有貉、貉二字而無貉，貉、貉異體的時代層次也尚需進一步落實，所以，把格伯和霸伯加以認同，尚存在音理及實際字例材料的不足。期待將來出土更充分更有力的材料，能逐步祛除學者們心中的疑慮。

本文傾向於認為棚生簋中的格伯是霸伯，如果這個說法將來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證明其成立，那麼我們就可以從族姓上排除器主是格伯的可能。不管怎樣，新出霸國銘文材料給我們提示了一個解決問題的考慮角度。

參考文獻

- 〔清〕吳式芬：《攷古錄》，光緒廿一年刻本。
- 于省吾：《雙劍謠吉金文選》，北平：大業印刷局，1932年。
- 孫詒讓：《古籀餘論》，戴家祥校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
-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
- 唐 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容 庚：《商周彝器通考》，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
-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
-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²⁶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293。

²⁷ 參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921-924；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15、429。

- 高 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 張 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
-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張舜徽集》本，上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李學勤：〈西周金文中的土地轉讓〉，《光明日報》1983年11月30日；收入氏著《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新出青銅器研究》（增訂本），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
- 張亞初：〈西周銘文所見某生考〉，《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5期。
- 連劭名：〈棚生簋銘文新釋〉，《人文雜誌》1986年第3期。
- 劉 釗：〈利用郭店楚簡字形考釋金文一例〉，《古文字研究》第2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黃天樹：〈辭比璽銘文補釋〉，《黃盛璋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深圳：中國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收入氏著：《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 張振林：〈釋「立𠄎成壘」與「鑄保簋用典格伯田」解〉，第四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舉辦於山東煙臺，2008年；刊於《文字學論叢》第五輯，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
- 張天恩：〈晉南已發現的西周國族初析〉，《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1期。
- 白於藍：〈師永孟新釋〉，《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5期，收入氏著《拾遺錄——出土文獻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 謝堯亭等：〈翼城大河口墓地發掘紀實——一個考古工地管理案例〉，《中國文化遺產》2011年第1期。
- 謝堯亭：〈棚國和霸國——晉南發現的兩個西周新封國〉，《故宮文物月刊》2012年第354期。
- 李建生：〈輝縣琉璃閣與太原趙卿墓相關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2期。
- 董 珊：〈試論殷墟卜辭之「周」為金文中的妘姓之珣〉，《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7期。
- 馮 時：〈霸國考〉，《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謝堯亭：〈解讀霸國〉，《呦呦鹿鳴——燕國公主眼裏的霸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

黃錦前、張新俊：〈說西周金文中的「霸」與「格」——兼論兩周時期霸國的地望〉，《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5期。

謝堯亭：〈發現沉睡3000年的「霸國」——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大眾考古》2016年第8期。

喬文傑：〈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出土西周霸國文物珍品〉，《藝術品》2016年第1期。

魏宜輝：〈復丰壺銘文補釋〉，《漢語史與漢藏語研究》第一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發掘〉，《考古學報》2018年第1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號墓發掘〉，《考古學報》2018年第2期。

葛 亮：〈復丰壺探研〉，《傳承與創新：考古學視野下的齊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陳英傑：〈商周金文異體字研究：以「旅」字為例〉，《中國文字》新45期，臺北：藝文印書館，2019年。

鄒芙都、馬超：〈西周金文所見佚記古國及相關問題討論〉，《歷史研究》2019年第5期。

朱其智：《格伯簋還是棚生簋》（未刊稿）。

附錄


格、霸相關字形對照表

「格」字	出處、時代	其他說明	「霸」字	出處、時代	其它說明
	格伯簋， 《集成》3952 西周中期	作器對象： 晉姬	蓋：  器： 	霸伯簋， M1017：8。 M1017 年代屬西周中 期偏早階段 ²⁸	山西翼城大 河口西周墓 地 1017 號墓
蓋：  器： 	侂生簋 （格伯簋）， 《集成》4262 西周中期	全 銘「格 伯」出現四 次	蓋：  器： 	霸伯簋， M1017：40	與 M1017：8 銘同
	侂生簋（格伯 簋），《集成》 4263 西周中期	銘文中間脫 十七字	蓋：  器： 	霸伯山簋， M1017：35	與 M1017：8 銘同
蓋：  器： 	侂生簋 （格伯簋）， 《集成》4264 西周中期			霸伯釳， M1017：42	原稱方簋， 今據自名
	侂生簋 （格伯簋）， 《集成》4265 西周中期			霸伯豆， M1017：11-1 M1017：14 M1017：34	三豆銘文同， 作器對象： 大廟
	格伯甗， 《銘圖》3311 西周晚期	翼城縣大河 口村西周墓 地 M2:37		霸伯孟， M1017:6	

²⁸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墓發掘〉，《考古學報》2018年第1期。文云：從墓中出土的青銅器銘文看，至少可知以下幾組器物是同批鑄造的，即M1017:8霸伯簋、M1017:40霸伯簋、M1017:35霸伯山簋，M1017:42霸伯方簋和M1017:70霸伯盃，以及四件霸伯豆。發掘者認為墓主是一代霸國國君霸伯。

	晉侯銅人， 《銘圖》19343， 西周晚期	銘云： 淮夷伐格	 ( ²⁹)	霸伯壘， M1017：66	
	格仲鼎， M2002：9。 ³⁰ M2002 年代屬西周中期 偏早	山西翼城大 河口西周墓 地2002號墓		霸伯盃， M1017：70	
蓋：  器： 	格仲簋， M2002：8	M2002：9 鼎銘同		霸伯盤， M1017：41	作器對象： 宜姬；既死 霸字泐 
蓋：  器： 	格仲簋， M2002：33	與 M2002：8 簋為一對， 銘同		霸伯簋， 《銘圖》4296 西周早期	山西曲沃縣 天馬——曲 村西周墓葬 M6197：11
				霸仲鼎， M2002：34	山西翼城大 河口西周墓 地 2002 號墓
				霸仲甗， M2002：52	
				霸仲簋， 《銘續》323 西周早期 ³¹	山西翼城大 河口西周墓 地 M1：67
				霸仲甗， 《銘圖》3200 西周早期	山西翼城縣 隆化鎮大河 口村西周墓 葬 M1：60
				霸仲盃，	山西翼城縣

²⁹ 謝堯亭：〈發現沉睡3000年的「霸國」——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大眾考古》2016年第8期，頁41。

³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號墓發掘〉，《考古學報》2018年第2期。文云：從墓中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來看，至少以下幾組器物是同批鑄造的，即M2002:9鼎、M2002:8和M2002:33扁腹圓簋，M2002:34鼎和M2002:52甗，M2002:5盤和M2002:23盃。M1017：41盤銘文與M2002:9鼎及M2002:8、M2002:33簋銘文當有一定聯繫，即便非同批鑄造，其年代應該相去不遠。發掘者認為，M2002年代屬西周中期偏早，與大河口M1017同時或略晚，可能屬西周中期穆王、恭王之際。墓主是M1017墓主霸國國君之弟霸（格）仲。謝堯亭認為，M1017:5洛仲卣（洛作）之「洛仲」可能就是「格仲」，也即霸仲。

³¹ 謝堯亭：〈發現沉睡3000年的「霸國」——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大眾考古》2016年第8期，頁34；喬文傑：〈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出土西周霸國文物珍品〉，《藝術品》2016年第1期，頁32。

				《銘續》963 西周中期	隆化鎮大河 口西周墓地 M1：270。與 上甗銘同。
				霸姬盤， M2002：5	M2002：23 鳥形盃與之 構成盤盃組 合，盃銘在 蓋上，為全 銘之後半段
			蓋：  器： 	霸簋 ³² ， 《銘圖》4610 西周中期	山西翼城縣 隆化鎮大河 口村西周墓 地 M1：93
			蓋：  器： 	霸簋， 《銘圖》4609 西周中期	私藏。 與 M1：93 霸 簋銘同
			蓋：  器： 	霸姑鼎， 《銘圖》1603 西周早期	
				霸姑簋，《銘 圖》4329 西周 早期	鼎、簋銘同
				曾仲大父螽簋， 《銘圖》5229 西周晚期	既生霸
			蓋：  器： 	曾仲大父螽簋， 《銘圖》5228 西周晚期	既生霸

³² 謝堯亭等：〈翼城大河口墓地發掘紀實——一個考古工地管理案例〉，《中國文化遺產》2011年第1期，頁90；喬文傑：〈封邦建霸——山西翼城出土西周霸國文物珍品〉，《藝術品》2016年第1期，頁32。